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教育文选译

● 郝秉键 ●



巴蜀書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教育文选译

郝 秉 健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李 蓓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教育文选译

郝秉键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巅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铤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开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这一剧烈的社会大变动相伴随，中国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传统教育逐渐向近代教育转变。在新旧教育体制的转化斗争过程中，教育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纷纷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教育主张，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界呈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局面。不言而喻，如此丰富的教育著述，很难用一选编书予以囊括。因此，本书只能主要收录著名教育作品，同时尽量顾及各派教育家的著述。为帮助读者了解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有必要首先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状况作一概述。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宁静。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华夷”战争，一些开明地主派率先从太平梦中惊醒，开始

重新认识世界，并提出一系列旨在挽救时局的教育主张。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先驱。

首先，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反对专事义理、考据、词章等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学以致用。龚自珍认为，一代的政治就是一代的学术，学术与政治本来就是统一的，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因此，他抨击了科举制的弊端，主张恢复西汉以前的经文，并努力寻求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之学。魏源也对当时教育现状非常不满。他主张废除书法试帖，学习有实用的学问。他说：“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图诤谏，图远猷始”^②。魏源和龚自珍一样努力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反对偏重训诂考据、脱离实际的“古文经学”。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序文里指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意思是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应当从现今实际事物出发。因此，他强调实际活动——“行”的重要性，主张先行后知、知从行来，反对“俗学之病人”和“腐儒之无用”。

其次，龚、林、魏等人要求学习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方针。林则徐不满当时教育的空疏无用，提出“师敌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治学》。

②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

之长技以制敌”。因此，他在广州禁烟时，曾“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其新闻纸”，并把有关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材料编成《四洲志》。这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洋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林则徐的“师敌”思想，后来又被魏源继承并有所发展。魏源根据《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例律》等介绍西方史地、政法方面的书籍，加以增补，著《海国图志》，增添了很多西方科技方面的材料，并介绍了美国、瑞士等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在这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力称颂西方科技的奇妙。他以林则徐的“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顽固派把西方科技看成是奇技淫巧的说法，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因此，他主张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向外国学习的精神：提倡科学技术，开设工厂，建立新式交通工业，制造器械等。他深信，只要中国人努力向这方面学习，一定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

显而易见，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教育思想已在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开启了近代教育改革的车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十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为了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也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主张。其内容如下：

第一，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注重科学技术，要求学习西方文化教育，放眼看世界。据历史记载，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洪秀全等人就表示要仿造汽船、铁路、电线及其他西洋机器。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当时清朝教育的空疏腐化，另一方面尽力罗致、培养各种科技人才。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

法、德、美、俄等国情况，希望太平天国革除社会陋习，设立邮亭、新闻馆、书信馆、士民公会、学馆等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第二，提倡儿童、妇女教育。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记载，太平天国对儿童实施一种普遍性与平等性的教育制度：“凡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此外，太平天国还创立一种“带徒弟”的教育制度，鼓励各级官员多多收养儿童，用父子般亲爱的教育方法授予儿童各种知识和技能。另据《太平天国亲历记》记载：“太平天国尊重妇女地位，认为妇女为男子的伴侣，在教育上她们受到了同等的注意。”

第三，主张改革文字和科举制度。太平天国在文字改革方面较有成绩，其文书不但一律加以标点符号，还颁布了反对封建古文、提倡语体文的命令。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反对“浮文”、“巧语”、“故实”，“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使人一目了然。此外，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加以改进，既简化了科举手续，又改变了考试内容，不论男女贵贱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科考。

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农民革命教育的新篇章，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在清王朝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新的事变，即洋务运动。这是一个以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贵族官僚为领导的救亡图存运动，其行动纲领就是“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基本教育思想。著名洋务活动家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一思想予以充分阐述。他认为，“中学”主要指以纲常名教为思想内核的中国“经史之学”，“西学”主要指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制造工艺技术。二者的关系是：“中学”为本，可以“正人心”，“西学”为末，可以“开风气”；“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否则就会导致离经叛道。很明显，“中体西用”的宗旨就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之洞提出一系列改革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议：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学校应当新旧兼学、政艺兼顾，不应成为科举的附庸；要重视留学教育，发展实业教育；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废止旧式朝考制度。

“中体西用”思想，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科学来造就一批能维护封建制度，进而达到“自强求富”目的的人才。这一思想尽管有极大的局限性，但明确肯定了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思想，客观上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有一股与洋务教育思潮相伴而行的教育思潮，即早期改良主义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有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

容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位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主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设立各级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武备学校、海军学校等。他在《予之教育计划》中，力主选派优秀青年去美国留学，并建议发展汽船、矿务、铁路运输等，借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中指出：人才的多寡，取决于学校，“学校隘则人才乏，学校广则人才

多”，因此国家应当大力兴办学校。

冯桂芬曾在《改科举议》、《采西学议》、《广取士议》和《停武试议》等文中，提出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他大胆揭露科举制度只能“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他极力要求发展西学，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择十五岁以下儿童入馆学习，借以培养翻译人才。郑观应主张建立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校，并认为学校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在《考试》一文中，曾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他还要求学习西学，废除八股，改良科举，主张文试要“废时文”，武试要“废弓矢”。

王韬曾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以欧洲为模式的变法自强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要求对人民施行以君主立宪政治为中心的教育，提出“教民以富”的实业教育计划。在兴办学校方面，他提出着重设立专科、实学及“时务”方面的学校，要求提高教学效率，撤换无能的地方教谕训导和书院山长。在改革科举方面，他力主废八股，“专注于器艺学术，废帖括，重实学”，“不尚虚文”。

总而言之，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学西学、设学校、改科举等重要教育主张，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三

19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首的变法领袖们在总结洋务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有系统的教育改革计划，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思想体系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托古改制”、“三世进化”为理论依据的变法维新教育思想。“托古改制”是康有为的主要理论武器，他在《孔子改制考》中，特别发挥春秋三世之义，把自己的变法思想，依附于孔子的言论，继承了今文经学家的讲学论政学风。他在大讲西学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思想，并结合《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对他所强调的孔子春秋三世进化中的大同世界作了远景描述，从而建立起他的比较系统的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进化的时代，因此必须实行符合“升平世”时代要求的小康主义教育改革，为将来的大同主义教育准备条件。他强烈要求改革旧教育，模仿西方近代学校制度，大力发展科技，工艺教育，重视商学研究、开展君主立宪思想教育，提倡“群育”、统一语言、加强妇女、儿童教育等。

梁启超也是“三世进化”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严正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广大妇女不读书，农工商兵也不知学，

而少数知识分子又都埋头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盼望猎取功名利禄。因此，他呼吁，中国如欲谋求富强，非大力培养人才不可；而培养人才，又非改变愚民政策不可。他提出培养人才的主要办法是改变八股取士制度，学习西方学校制度，特别要注重师范、女学和幼学。

严复大力宣传“天演论”思想，支持了“三世进化”理论。他坚决反对八股取士，认为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知识分子“习为剿窃诡随之事”，“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在他看来，被统治者奉为主臬的理学是无用无实之学，其它如考据、古文、词章之学，也都空泛乏味，毫无益处。因此，他高呼“大讲西学”，强调“西学为中国诸务之急”。

第二，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维新派反对“中体西用”，要求体用合一地引进西方文化。严复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西方“皆有以胜我者也”。例如，在政治上，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优于我国专制政体；在体格上，西方“鸷悍长大，即胜我矣”；在品德及智力上，西方人“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因此，在学习西方科技时，还必须同时学习西方政教，因为“体”与“用”是统一的，“有牛之体，然后有牛之用”，要讲西学之“用”，就不得不讲西学之“体”。严复认为，全面向西方学习，主要在于民智、民德、民主三方面。要想开发民智，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及语言文学，学习西方的治学方法；要想发展民德，就要学习西方人的美德；发扬西方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精神和“皆为天之赤子”的平等思想。

第三，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教育思想的萌发。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虽然一再鼓吹君主立宪，但以谭嗣同为首的少数激进人士

逐渐偏离了“尊君”航道，出现了“民主”意向。谭嗣同认为法国革命是“泄万民之恨”的正义事业，提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的口号，在《仁学》一书中，他把封建纲常斥为“暴乱无理之法”，大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说，断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另一位维新活动家唐才常也再三讴歌美国革命，把美国式民主立宪看作是“风俗纯厚，洵乎大公”，要求打破专制体制，“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民主思想的萌发，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已发生了重大转机，从此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由尊君向隆民过度。

四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从“革命”需要出发，纷纷阐述“革命之教育”，从而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以孙中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最为突出。

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首先，他提倡民权思想教育。他认为，要想在中国实行“宪治”，就必须发展教育，向民众灌输民权思想，“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因此，他十分重视民主精神的培养和运用民主政治能力的训练。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了所谓的“训政”计划，其目的就在于教育人民摒弃“专制时代的种种恶习”，学会运用新的政治体制。他认为，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速达也。”因此，民权思想教育刻不容缓。